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未來前景可期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黃金時代已落幕或許是不可否認的，已有證據顯示教育機構所付出的努力和大眾所投入的資源及關注度不成正比，促使許多人質疑國際化的價值及目的。

高教領袖面臨以下的質問：包括「該採取何種（What）措施以改變令人失望的結果？」、「應如何（How）以不同的方式做事？」、「為什麼（Why）要國際化？」而這3個問題正是領導學專家 Simon Sinek 的「黃金圈」（golden circle）策略思考法則的核心。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全球學習倡議辦公室（Office of Global Learning Initiatives）主任 Stephanie Doscher 在閱讀了高等教育紀事報 Karin Fischer 撰寫的封面報導「國際教育的黃金時代是如何失去光彩」（How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 golden age lost its sheen）後，不禁將其與黃金圈法則連結。Fischer 在文中提及，國際化的失敗源於「為什麼」的危機，大學對國際化的熱切擁抱缺乏底蘊，使國際化感覺更像是一個附加物、額外品、由掛著「國際」（international）字樣牌子的辦公室處理的事情。對於校園內、外的承諾可能過於淺薄，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不夠扎實。

Doscher 以黃金圈法則解釋國際化並不只是一件好事，而是必須做的事情。

一、為什麼國際化？

對於 Sinek 來說，「為什麼」（why）是一個價值主張（values proposition），正是目的、原因或信念促成及決定作些什麼（what you do）以及如何作（how you do it）。Fischer 發現許多人認為國際化是其他人的工作或職位存在的理由，與自身無關，那些以此方式思考的人自然會質疑其投資回報。

Doscher 認為國際化並不是單獨地存在，只是為國際化而國際化。參與跨國研究和教學合作、推廣在地國際化、支持學生和教師的移動力，以實現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標：創造並交流有關這個世界及其居民的新知識，正是國際化的目的。

當多元的想法和觀點在合作關係中聚集時，便實現國際化的目的。在互動及協商中，人們將不同想法的各個部分結合起來，形成一套全新的想法。教育機構內的教師和學生每天都參與這一過程，國際化將其提升為跨國規模。

在適當的條件下，國際化大幅促成了不同的人、思想和觀點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增強生產知識和實現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

二、何謂國際化？

國際化最常被引用的定義是由 Jane Knight 教授所提，意指「不同的教育機構、國家及部門在交流互動中，將跨國、跨文化或全球化的面向整合到高等教育的目標、功能和傳遞的過程，即為高等教育國際化」，自此後多被引用為教育國際化的定義。

而 Hans de Wit 和 Fiona Hunter 提出了一個更新的版本，指出國際化應該使教育機構能夠「提高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的教育及研究品質，並為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Doscher 指出雖然這些定義澄清了國際化在不同的國家和背景下，目的有所不同，但它們可能會被誤解並被描述為一種自利（self-serving）現象。他表示，需要一個以多面向（multilateralism）和合作為基礎的定義。如 Gabriel Hawawini 於 2011 年發表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以互惠互利為前提，將國際化定義為將「教育機構融入新興的全球知識與學習網絡」的過程。

Hawawini 表示該過程應該是外向的，強調機構的能力和才能，成為世界知識與學習「生態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要從中受益，並透過互補專業知識及共生關係，為其發展做出貢獻。

三、如何國際化？

在高教國際化的黃金時代，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簡稱 ACE）的「全面國際化」（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模式是當時的最高標準，它符合了 Knight 的定義，詳細說明了該機構的使命及職能應如何統合跨國、跨文化及全球面向。

對於「為什麼」以及「何謂」國際化這兩方面，ACE 的模型為

該機構提供了有用的藍圖，然而在指導「如何」國際化方面仍略有不足，因為它並無涉及創造新知識的過程以及發展合作關係的方法。

Hawawini 所提出的國際化定義並沒有要求領導者對財政及功能永續性的追求，但他確實提及需要重新定位國際化的出發點。

Doscher 認為，如果國際化是為了實現高等教育的目的，則必須增進機構內的學生、教師和社區福利以及該機構的國際合作夥伴的福利。對世界知識創造生態系統的貢獻應成為不斷擴張的福祉圈(circles of wellbeing)，其利益擴展到該機構之外。從這個定義思考，國際化是一項集體企業，涉及建設性夥伴關係網路，以尊重不同貢獻者的動機、積極影響結果(bottom line)，並建立機會以增進知識交流與創造。

Doscher 進一步表示需要一個強調價值和增值的新模式，領導者可以透過集中精力在全球教學、學習和研究生態系統中建立有效益的關係，專注努力以下各項：

- 溝通 (communicating)：與其他機構交流獨特的目標以及學生、教師和社區的多樣性需求和觀點。
- 協調 (coordinating)：調整共同目的和價值觀，但同時允許不同的偏好和做法。
- 補足 (complementing)：設計一個培養和支持所有教育機構、教師和學生能夠為世界知識創造網路做出獨特貢獻的體系。
- 合作 (collaborating)：訂定共同的目標，並共同建構 (co-constructing) 互動的新方式，以便共同創造 (co-create) 新的想法和解決方案。

四、國際化的下一個偉大時代

Doscher 表示雖然需針對國際化的「何謂」、「如何」、「為什麼」進行調整，然而種種跡象表明這個世界正逐漸接受這個變化。

Fischer 的文章發布後，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發表了新的「2019 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以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 作為評核各大學對社會影響力的標準。對國際合作的線上學習和虛擬交流的關注和財政支持也在穩定增加、開放科學 (open science) 運動備受鼓勵、全球大學網絡正在蓬勃發展以及多樣化；且 Advance HE 等組織正在鼓勵進行全球對話，包括促進高等教育教學與領導力的平等、多

元化和包容性。

Doscher 認為雖然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但高教國際化新的一頁已展開，而且光明的未來前景可期。

譯稿人：陳潔希

資料來源：2019 年 5 月 11 日，大學世界新聞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9050611065642>

